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5~6

2015年3月11日

谨以此文纪念邓英淘逝世三周年

一带一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会主席 诺兰教授 (Peter Nolan)¹

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2014年3月28日

¹ 本文的简短版本发表于2014年3月的中国发展论坛，后为乌兹别克斯坦的会议“中世纪东方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历史传承以及对现代文明的作用和意义”准备了一个稍长的版本 (Samarkand, 2014年5月15~16日)。Tim Clissold、Stephen Perry 和张瑾对本文提出了意见，我谨表示感谢。

引言

2011~12年，美国宣布对战略方向进行重大调整，将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至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型地带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机遇和挑战都不断演化。因此，尽管美国军队将继续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我们势必要重新平衡，转向亚太地区。”²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确认：“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就像以前的各个世纪一样。”³她进一步阐述了美国战略方向的转变：“政治的未来将在亚洲决定，而不是在阿富汗或伊拉克决定。美国将处在行动的正中心……因此，美国未来十年治国方略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确保大幅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外交、经济、战略及其他投入。”⁴

未来几十年美国国际关系战略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打造一个亚洲政治和军事的同盟网，美国认为再次介入亚洲对该地区的未来极为重要：“该地区渴望我们的领导和参与——也许比近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渴望。我们是唯一一个在该地区拥有强大同盟网络却没有领土野心、有着为共同利益提供长久支持记录的强国……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在整个太平洋打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持久的关系网，正如我们在大西洋所打造的一样。”⁵

直到约两百年前，欧洲对中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本身的了解极为有限，主要是从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与东亚交易的中间商那里获得

² 美国国防部，2012：2。

³ Clinton, 2012。

⁴ Clinton, 2011。

⁵ Clinton, 2011。

二手信息。库克船长在 1768~1779 年进行了著名的探索航行，此时欧洲人几乎不了解亚太地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于 1776 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时，美国由一小群聚居在辽阔北美大陆东部边缘的殖民地居民组成。⁶ 远眺太平洋的西海岸加州只在 1850 年才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连接中西方的“一带一路”政策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的关键部分。2013 年 9 月 7 日，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 年 10 月 3 日，他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中提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两千多年来与亚洲邻近地区有着深厚关系，通过新疆与中亚、通过南海与东南亚保持着深厚长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新疆和南海分别构成中国进入中亚和东南亚的“门户”。

2013 年，习主席访问了中亚，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次访问意义特别重大，因为还没有美国总统访问过苏联解体后的前苏联中亚国家。习主席还访问了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于 2014 年春出访欧洲。他在这些出访的一系列演讲中清晰阐述了在新的“一带一路”上建设中欧桥梁的中国构想，特别重视港口、机场、公路、铁路、水电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些对于刺激商业关系极为重要，而商业关系是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

习主席每次出访都强调理解历史对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过去总是现在的钥匙，现在总是根植于过去。我们只有了解一国的来龙去脉，才可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今天是这样，才能意识到这个国家现在的走向。”⁷ 他强调商业关系对

⁶ 1780 年，美国只由位于北美大陆极东边缘的 13 个州组成，当时人口有 280 万，其中 220 万是白人，大部分来自英国，60 万是黑人，大部分是奴隶。

⁷ 习近平，2014b，译者注：中文译自英文。

文化交流与和平发展的贡献，一再指出增进彼此文化了解对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与他人交流并向他人学习，文明才能焕发全面活力。如果所有文明都能坚持兼容并包，所谓的‘文明冲突’就不会发生，文明的和谐将成为现实。”⁸

中国和欧洲处于新丝绸之路的两端。习主席的演讲指出中欧之间自古以来沿着水陆交通建立了长期联系：“我们需要建设共同文化繁荣的桥梁，将中国和欧洲这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他在访问中强调了中國思想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对欧洲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就是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引起了世界的变化，包括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哲学、文献、医药、丝绸、瓷器和茶叶抵达西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马可·波罗游记》广泛激起了人们对中国的兴趣。”⁹

习主席强调了中亚和东南亚作为连接中欧两地桥梁的重要性：“桥梁不仅让生活变得更加方便，还可以是沟通、了解和友谊的象征。我到欧洲，是为了和欧洲的朋友一起，搭建一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友谊和合作之桥。”¹⁰

一、陆上丝绸之路：西域

公元前一百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 138 年和 119 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

⁸ 习近平，2014a，译者注：中文译自英文。

⁹ 习近平，2014a，译者注：中文译自英文。

¹⁰ 习近平，2014b，译者注：中文译自英文。

果……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 70 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经济地理

“西域”又称“大突厥”，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心脏地带，从中国甘肃省的玉门关起，延绵约一千英里至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的鄂克斯河（当地语称“阿姆河”）。翡翠（软玉）的源头位于新疆中心和和田四周的山坡和河床中。天山~昆仑山脉将西域一分为二，新疆的“内突厥”和中亚的“外突厥”通过贸易同住在“大突厥”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两千多年来紧密相联。两千多年来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大夏双峰驼，大型驼队通常有两三千匹骆驼。

新疆组成“内突厥”的主要部分，欧文·拉蒂摩尔将新疆称为“中国通往亚洲心脏的前门”，¹¹ 其中心是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四周山脉中流下的水灌溉了盆地周边的一系列绿洲。中国对中亚的全面了解始于汉武帝的使节张骞，张骞出使西域 13 年（公元前 13~126 年），从新疆进入中亚，报告西域的情况。万里长城始建于公元前 221~206 年，部分是为了保护从新疆进入中亚的贸易路线。汉武帝在公元前 141~87 年当政，他下令修建的玉门关成为中国进入西域的入口。玉门关位于长城终点和河西走廊东端。河西走廊北接戈壁沙滩，南临西藏群峰，狭促地挤在两者之间。

¹¹ Lattimore, 1950: ix.

尽管新疆“两千多年来都处于中国的政治版图之内”，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一直是断断续续的。¹² 在汉朝（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唐朝（公元 618~907 年）、元朝（1271~1368 年）和清朝（1644~1911 年）的一些年间，中国直接控制新疆，新疆和中亚之间有一种“中国治下的和平”关系。中国只有一次真正努力在新疆以西建立控制。公元 751 年，穆斯林国家阿巴斯哈里发帝国的军队在现属吉尔吉斯斯坦的塔拉斯之战中打败中国军队，此后中国再没有试图将疆域扩大到天山山脉以外的中亚地区。

几千年来，贸易将西域与中东、俄罗斯和印度连在一起：“亚洲腹地的史前记录现在可以一路追溯到石器时代的迁徙以及欧洲与中国之间整个地区的贸易……在黑海和黄河之间，远古的商旅和文化传播之路横贯了亚洲腹地。”古时的贸易路线在相继发生的政治和宗教动乱中成功保存下来，新疆和中亚的联通地区成为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之间的“阀门”：“贸易、迁徙和征服的活动由此悸动。”¹³

“河中地”（古代粟特）是中亚的核心，位于阿姆河（鄂克速斯河）和锡尔河（古称“药杀水”）之间，包括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两个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如果更广义地定义中亚的“宽泛文化区”，则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新疆。该地区在历史初期就开发了复杂的灌溉系统和城市居住系统。公元前一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将中亚描述成“千城之地”，包括由富庶农业地区环绕的伟大城市贸易和制造中心，这些农业地区有缚喝（今阿富汗的巴尔赫）、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和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的

¹² Lattimore, 1950: 5。

¹³ Lattimore, 1950: 6~7。

撒马尔罕)。城市的贸易关系延伸到了印度、中东和中国：“中亚城市（在古代晚期）的独特成就是将大规模灌溉系统所需的成熟组织能力与出口引导的农业和制造业结合起来，并培养了大量走遍世界的贸易商以及管理他们交易的生意人。”¹⁴“河中地”周边的王国繁荣昌盛，包括西部的花刺子模国，南部的大夏国和东部的大宛国。该地区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侵略，间或才由某位统治者暂时统一。不过，整个地区受到共同力量的有力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来传播，最重要的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但也包括拜火教和苏非教。

佛教时代

贸易。公元前 73~49 年，中国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了完全控制，占领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主要城市。通过征服新疆，中国成为“塔里木无可争议的主人”，连接中国与西方的行商路线得以经常使用。¹⁵中国农业技术和灌溉方法的引入，帮助了沙漠两边一系列“绿洲王国”的发展，包括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和于阗（今新疆和田）。到公元一世纪，这些城市已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丝绸之路通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和南部，也穿过准噶尔通往天山北部。

丝绸之路在汉朝得到发展（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¹⁶ 此

¹⁴ Starr, 2013: 29~35。

¹⁵ Talbot-Rice, 1950: 175。

¹⁶ 公元前 106 年，第一批横贯丝路的商队从中国穿过大夏，将丝绸直接从中国带到波斯（Talbot-Rice, 1965: 140）。丝绸之路的西部终点位于中东的伟大贸易城市，包括佩拉特的著名考古遗迹。帕尔米拉是这些城市中最伟大的，为商队提供金融服务并在边远地区设立驿站，驿站中为商人及其动物提供的旅馆，为商品提供的储物库，还有办公室和一间神殿（Liu Xinru, 2010: 31）。

时欧洲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实现了统一。中国从中亚进口各种物品，包括战马、香料、香水、葡萄酒、宝石（例如天青石）、金银器和玻璃器皿。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对中亚的主要出口是丝织品，中亚也有自己古老的纺织业，很多制品都出口。它学习中国的技术，发展自己的丝织业，而且借鉴和改进了中国的造纸术，发展自己的造纸业，用棉纤维代替丝。¹⁷ 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丝线和丝织品，到周朝末年（公元前 221 年），玻璃制造的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国。¹⁸

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百年中，横跨中亚的贸易有很多都经过贵霜王国。贵霜王国在公元 1~3 世纪的鼎盛时期统一了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众多地区，纵横交错的道路将贵霜王国与印度、中国和中东连接起来：“贵霜帝国通过这些方式接触到世界最伟大的文化中心。商队所经之处，特别是丝绸商队所经之处，产生了智力和文化的交流。”¹⁹ 考古队在阿富汗迦毕试的贵霜避暑行宫中发掘出的珍贵宝藏包含各式各样的异域器皿，²⁰ 有来自地中海的青铜雕像、印度的象牙雕刻和中国的漆器。这些宝藏几乎肯定包括来自中国的丝制品，不过已经腐坏了。²¹

汉朝在统治末年失去了对新疆的控制，贵霜帝国也瓦解了，不过大量中国丝绸继续穿越中亚：“大部分归功于由宗教机构、商户组织和地方社区维护的自动贸易网络。”在整个佛教时代，丝绸仍是丝绸之路上交易最频繁的商品。虽然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中亚

¹⁷ Starr, 2013: 46~7。

¹⁸ Sullivan, 1964: 187。

¹⁹ Talbot-Rice, 1965: 142。

²⁰ 迦毕试位于阿富汗，毗邻现在的巴格拉姆，巴格拉姆在美国占领阿富汗期间是大型美军基地。2014 年一位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人士对美军从巴格拉姆撤军评论道：“在外国人来以前，什么都没有”（《金融时报》，2014 年 9 月 10 日）。

²¹ Liu Xinru, 2010: 48。

丝绸之路沿途的绿洲城市却存活下来并繁荣昌盛，这部分丝绸之路地区发展成为“相对稳定和可维持的商业干道”。罗马帝国瓦解后，丝绸继续在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占据着重要位置，尽管它发展出自己的编织业，但丝线还是经由中亚从中国进口。²²

由于商人起到的关键作用，中亚城市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的主要国际中转站”，构成“为中国、印度和中东之间贸易服务的主要银行业和金融中心。”²³ 中亚城市不仅是庞大贸易网络的总部，还是生产制造的中心，很多制品都出口，包括像刀刃、螺丝、曲轴和泵管这样的优质钢制品，以及玻璃器皿、药品和各种异域产品，²⁴ 甚至还有乐器。这些只是出口到中国 and 丝绸之路上其他地区的无数产品的一部分。

尽管中国当时是世界最重要的丝线和丝织品生产国，²⁵ 但中亚自己生产丝织品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到公元 5~6 世纪，中国和中亚之间就专业丝制品及其技术流程发展出复杂的双向交流。²⁶ 到 18 世纪末，桑蚕吐丝的技术从中亚一路传入中东，包括拜占庭和北非，粟特的贸易城市（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丝绸服装变得越来越漂亮。粟特人发明了“刻丝”艺术，由维吾尔人加以改进，11 世纪中国人使其变得完美：“到中世纪末，刻丝织片已传入欧洲，在但泽、维也纳、雷根斯堡和其他地方被织入大教堂的法衣中，卢卡的纺织工匠仿制中国的龙凤，并根据中世

²² Liu Xinru, 2010: 62~74.

²³ Starr, 2013: 44.

²⁴ Schafer, 1985.

²⁵ 世界贸易约 80% 的生丝由中国生产。

²⁶ Liu Xinru, 2010: 80.

纪晚期的装饰规则加以改造。”²⁷著名的“撒答刺欺”织锦是在布哈拉附近的撒答村制造的。数百年来，五颜六色、绣着生动动物主题的织锦被制作出来，沿着整条丝绸之路贩售。撒答刺欺织锦在丝绸之路的一端装点着中世纪的欧洲教堂，在另一端装点着敦煌的佛教洞窟。²⁸

公元七世纪，唐朝（公元 618~907）重新建立了对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绿洲城镇的控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达到新高，“整个近东和中东的集镇上都能找到来自中国的货物”：“川流不息的驼队载着中国货物穿过中亚的干道。”²⁹在相反方向，“载着异域商品的驼队成群抵达长城关口。”³⁰公元 7~8 世纪，中国的都城长安（现代的西安）是世界最伟大的城市：“街上满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与如此庞大帝国的都城正相适宜。有些是来自印度的传教士，有些是来自波斯和中亚王国的官员和商人，还有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商……佛教和道教殿堂、回教清真寺、摩尼教和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古称景教）的教堂并肩耸立。”³¹

文化。由于汉朝军事力量进入新疆并且贸易关系深化，汉朝文化深受中亚影响。汉武帝征服新疆，使中国的旅行商人出行中亚相对容易，旅行商人带回许多故事：“中亚有辽阔的沙漠和壮丽的山脉；昆仑是世界的轴心；匈奴人在沙漠中打仗狩猎；印度是奇怪新宗教的家园。”汉朝的艺术“充满西域（即中亚）主题……受到西

²⁷ Sullivan, 1964: 184.

²⁸ Liu Xinru, 2010: 82~83.

²⁹ Sickman 和 Soper, 1956: 143.

³⁰ Liu Xinru, 2010: 87.

³¹ Sickman 和 Soper, 1956: 143.

域影响的证据在汉朝艺术中随处可见。”³² 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汗血宝马成为汉朝的皇家标志，深深融入汉朝的象征物件中。³³

相继出现的不同民族和文化通过征服、贸易和传教活动影响了中亚。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 334~323 年征服了大夏和粟特，希腊人在中亚修建了无数由城墙包围的城市，许多希腊定居者在亚历山大的中亚帝国瓦解后留了下来。古希腊文化对中亚有着深刻影响，但又与来自印度东部的佛教文化交织在一起。佛教借助中亚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始于汉朝：“很难想象，中亚以前在近千年来对佛教的笃信程度与现在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程度并无二至。但自公元前一或二世纪直至阿拉伯人的征服，确实如此。”³⁴

历史上的佛祖生活在约公元前 500 年，是摩揭陀国（今尼泊尔）的王子。佛教从贵霜王国统治下的印度北部传入中亚，王国的钱币一面刻着统治者的图像，另一面刻着佛祖的图像。贵霜帝国的艺术带着浓烈的古希腊风格，大部分是通过丝绸交易形成的，这种风格逐渐与印度佛教风格融合，产生了佛教雕塑和绘画风格的原型，并从印度北部的犍陀罗传入中亚，再从中亚传入中国。大量的佛教建筑、艺术和雕像都是于穆斯林时代之前在中亚制造的。信佛的商人为丝绸之路上的寺院布施，寺院本身也常常成为大型的商业企业。在公元八世纪伊斯兰教征服中亚前，“佛教机构在丝绸之路的欧亚东部沿途各处提供了基础设施。”³⁵ 寺院与之后的欧洲教堂一样制造了精美的宗教物品，通常由珠宝和宝石包裹。这些物品包括壁画、

³² Sullivan, 1964: 217.

³³ Liu Xinru, 2010: 18.

³⁴ Starr, 2013: 81~84 包含一张 1903 年的珍贵照片，内容是从巴基斯坦的沙里拔罗发掘出的一尊完好无缺的佛像。

³⁵ Liu Xinru, 2010: 72.

雕塑、庙宇、丝绸画和在悬崖峭壁上雕刻的巨大佛像。从（阿富汗）的巴米扬立佛到（山西）的云冈石窟，整条中亚丝绸之路上林立着巨大的佛像。³⁶

公元前约 120 年，商人和传教士沿着从中亚到中国的商队路线将佛教传入中国。汉朝灭亡（公元 220 年）后五百年间，佛教在中国深深扎根：“连接中国与西域的沙漠之路……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各种思想和艺术形式涌入中国的干道。”³⁷ 公元 4~8 世纪的整个时期可以被看作是“佛教时代”，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亚洲都是这样：“（佛教）席卷了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以外的整个亚洲大陆，为这个辽阔的地区带来了文化统一，统一程度之高后无来者。”³⁸

佛教在扩张的头几百年里，“得到了传教士和朝圣者源源不断的滋养，这些人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往返流动。”³⁹ 约两百名中国僧侣历经艰险长途跋涉到印度，在佛教的发源地取经，这些僧侣的姓名都记载在册，最著名的是法显和玄奘。法显于公元 399 年动身前往印度，穿过中亚，于公元 414 年乘船回到中国。⁴⁰ 唐朝的力量在七世纪和八世纪早期达到顶峰，在“中国治下的和平”，传教士和朝圣者可以在中亚各地自由往返。⁴¹ 玄奘在 629~645 年前往印度北部后回到中国，他回来后写下了著名的游历见闻录《大唐西域记》，⁴² 并倾注毕生之力将佛经译成中文。中亚的学者和僧侣对佛经的中译起到了

³⁶ Liu Xinru, 2010: 64.

³⁷ Sickman 和 Soper, 1956: 86.

³⁸ Reischauer 和 Fairbank, 1958: 147~148.

³⁹ Sullivan, 1964: 221.

⁴⁰ Fa Hsien, 1886.

⁴¹ Sullivan, 1964: 224~245.

⁴² Beales, 1906.

至关重要的作用。⁴³

中国的佛教寺院累积了大量经济资源，并将自身功能扩展为“被迫害者的避难所、旅客的驿站、医院、公共浴场，甚至是原始的银行机构。”⁴⁴ 中国出产的大批佛教雕塑和绘画多姿多彩，融汇了古希腊、印度、中亚和中国的艺术传统，包括敦煌、云冈、龙门和龟兹等瑰丽的石窟。敦煌位于甘肃西部，是一座绿洲城市，由于地处“中国和西域国家之间的大干道”，发展成为贸易和佛学的繁荣中心。敦煌石窟包含大量从五世纪末到八世纪的佛教绘画。山西的云冈石窟藏有公元五世纪制作的精美佛经卷册：“混杂多种语言的佛教传到中国时，所有语言——古希腊语、犍陀罗语、印度语、伊朗语和中亚语——开始融汇成一种表达中国信仰和热情的一致宣言。”⁴⁵ 洛阳是魏朝（公元386~556年）的都城，据说公元六世纪时有三千名外国僧侣在这里居住。洛阳的龙门石窟汇聚了一大批崖壁佛雕和数千座较小的雕像。龟兹位于新疆西部，克孜尔石窟包含14座佛教洞窟，这些洞窟有八百多个岩洞和制作于公元2~7世纪的大量佛教绘画和雕像。玄奘在七世纪参谒龟兹石窟，在此停留两个月。公元258~312年，至少有六名龟兹僧侣参与了包括《妙法莲华经》在内的佛经中译。⁴⁶ 到三世纪，龟兹僧侣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印度、中亚和中国佛教的“文化经纪”，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鸠摩罗什（344~413年），据说他将约三百本佛经译成了中文。⁴⁷

⁴³ 苏联学者李特文斯基推测：在将佛经译成中文的已知译者中，六位是印度人，6~7位是中国人，但16位是中亚人（Starr, 2013: 86）。

⁴⁴ Reischauer 和 Fairbank, 1958: 175。

⁴⁵ Sickman 和 Soper, 1956: 135、90。

⁴⁶ Ghose, 2008: 12。

⁴⁷ Ghose, 2008: 13~15。

唐朝包容四海的特质不只反映在宏伟的佛雕和寺院中，其艺术和工艺还显示出中亚在各方面产生的惊人影响：大量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工作，从中亚进口的异域货物源源流入中国，都带来了影响：“从波斯和萨珊进口的物品，例如双耳细颈瓶、角状杯和贝壳杯，进口时是金属制品，结果陶器也按这样的形状来制作；西域银器的凸纹面装饰被复制到陶制执壶两边的镶花浮雕上；白瓷器被用来仿制阿拉伯的玻璃杯。洛阳和长安街道上熙熙攘攘的外国人做着自己的买卖，践行着自己的宗教仪式，对于这番景致，墓穴的陶塑上常有着生动的描绘或揶揄。”⁴⁸

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征服中亚后，佛教遭到打压。很多佛教徒退避到新疆，进一步加强了佛教在该地区已起到的重要作用。841~845年的暴力袭击严重遏制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⁴⁹随后，佛教再没有恢复到像欧洲基督教那样的全国性有组织宗教的地位。不过佛教仍是中国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这包括与禅宗相关的超凡脱俗的禅画（禅宗结合了中国道教传统和来自印度及中亚的佛教）。⁵⁰13世纪是禅画的鼎盛时期，包括大量山水画、人物画，还有最重要的静物画，例如牧溪的《六柿图》，将“激情内敛在惊人的静谧中。”⁵¹

⁴⁸ Schafer, 1986; Sullivan, 1964: 215.

⁴⁹ 据官方记载，4600家寺院和四万个神祠在这些年间被摧毁（Reischauer and Fairbank, 1958: 175）。

⁵⁰ 斯塔尔指出苏非教和拜火教与主张冥想的佛教之间可能有联系：“寻求消除自我、从凡尘俗世中解脱和拥抱永生的中亚苏非教，其精神和灵魂的修炼与引发塔吉克斯坦修建佛祖‘大般涅槃’（最高境界涅槃）巨像的佛教传统最终相差多远？”（Starr, 2013: 98）。另外还可以说佛教的冥想派与道教之间有联系。西方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与东方的神秘主义传统也很相似。

⁵¹ Arthur Waley（引自 Sickman and Soper, 1956: 263）。牧溪的大部分绘画保存在日本藏画中。像“六柿图”这种画的意境与欧洲17~18世纪精雕细琢的“静物画”截然不同，西方绘画与之最接近的可能是也试图接近佛教“大同”思想的20世纪“抽象”艺术。

1368年，蒙古人的元朝灭亡后，元朝王族返回蒙古，此后蒙古人开始全面皈依佛教。到16世纪，蒙古人信奉的主要佛教形式是藏传喇嘛教。佛教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不再是正式的宗教，而是被道教吸收，但在蒙古和西藏，佛教仍然是以寺院和祭司为基础的正式宗教。

穆斯林时代

阿拉伯人在7~8世纪征服了波斯和“河中地”后，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成为整个中亚的信仰系统。尽管伊斯兰教也多次经历兴衰，但始终处于中亚文化的核心，今天该地区几乎没留下什么千年来信奉佛教的痕迹。1526年，巴布尔在帕尼帕特战役中取胜，随后建立了莫卧儿帝国，穆斯林的影响由此从中亚深入到印度。8~9世纪，中亚在波斯征服者、建都于布哈拉的萨曼王朝的统治下繁荣起来：

“以农业、手工艺品和贸易为基础的繁荣使他们的王国成为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来客的艳羡对象。”⁵²突厥的喀喇汗王朝在千年之交取代了波斯的萨珊王朝，统治中亚直到12世纪。

在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哈里发的统治下，穆斯林商人主宰了整个中亚的贸易路线：“穆斯林贸易商很快接管了丝绸之路上的大多数贸易，而伊斯兰教就像之前的佛教一样，在所有的主要贸易路线上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为丝绸

不过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利文强调中国禅画家与现代抽象艺术家不同：“即使是最极端的中国表现主义派也总是寻求纯粹形式背后的意义……牧溪和莹玉涧对玄奥狂放意境的表达不是反映在空洞的笔划中，而是反映在和尚撕经或雾中浮现山村这些形态中。对画家和书法家来说，空有形式从来都是不够的。”（Sullivan, 1964: 199）

⁵² Soucek, 2000: 73.

之路的一大片区域（提供）基础设施。”⁵³ 伊斯兰商业庇护人遵循之前阿拉伯统治者的做法，在整条丝绸之路上沿途兴建驿站，为商人及其动物和商品提供住宿和安全保障。例如，11~14 世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赛尔库克（1037~1144 年）和奥斯曼（1453~1922 年）的统治者在该地区兴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驿站，为贸易，特别是与中亚的贸易提供便利。⁵⁴

蒙古人在 13 世纪征服了亚洲大部分地区，他们大肆破坏，摧毁了包括伊斯兰和佛教艺术品在内的不少物品。不过在蒙古人的统治下，13~14 世纪，从中国到中东的辽阔疆域是一个统一帝国的组成部分。暴力征服结束后，由于处在蒙古帝国中心，又是各文明交汇的地带，蒙古治下的中亚享受了相对的和平和繁荣。1257 年，忽必烈可汗在大都（今北京）建都时，从布哈拉带来纺织工匠为蒙古皇室制作织锦，特别是撒答刺欺织锦：“忽必烈可汗选择用服饰来体现其王国的帝国荣耀，令其全体随从，包括宫廷卫戍在内穿着绣金织锦。”⁵⁵

正是由于“中国治下的和平”所实现的统一，马可·波罗才得以游历中亚。马可·波罗沿途经过众多兴旺发达的商业城市，包括巴格达和巴士拉（在今伊拉克境内）、大不里士、亚兹德和克尔曼（在今伊朗境内）。马可·波罗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沿途兴旺发达的新疆绿洲城市，包括叶尔羌（今莎车）、媲摩（今于田）、车尔臣（今且末）、喀什和于阗（今和田）。关于喀什，他写到：“（它）曾是王国，但现在受大可汗统治。村镇众多，居民以贸易和劳作为生，果园和葡萄园丰美，房屋鳞次栉比。大量种植棉花、

⁵³ Liu Xinru, 2010: 106.

⁵⁴ Stierlin, 1998.

⁵⁵ Liu Xinru, 2010: 123.

亚麻和大麻。土地肥沃多产，生活资料丰富。很多准备在世界兜售器具的商人将该国作为起点。”关于于阗，他写到：“（它）受大可汗统治……市镇众多……生活资料储备充足。大量种植棉花，有众多葡萄园、房屋和果园，人民以贸易和劳作为生。”⁵⁶

1370年，穆斯林突厥人帖木儿在中亚夺得权力，成立王朝，该王朝在1370~1507年统治中亚。尽管帖木儿的战场辽阔，从新疆打到叙利亚，但帖木儿帝国的核心是“河中地”。这个时期是中亚史上“最辉煌的一章”：长途贸易再度兴盛，包括与明帝国的贸易。横跨中亚的庞大贸易路线在位于丝绸之路西部终点的安纳托利亚半岛激发了一个大繁荣时代。⁵⁷ 13~14世纪，中国向中东和欧洲“无限量”供应生丝，⁵⁸ 在塞尔库克帝国和早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主要由穆斯林商人开展的贸易在整个中亚持续繁荣：“伊斯兰突厥人将统治范围从中亚扩大到巴格达、埃及和南欧后，从中东到中亚的丝绸和羊毛挂毯及小毡毯的发展达到高潮。”⁵⁹

这为中世纪欧洲丝织品业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布尔萨成为“东西之间的世界市场，不仅是生丝的，也是其他亚洲货物的市场，因为世界贸易路线的网络在14世纪发生了革命性变化。”⁶⁰ 除了来自中国的丝绸，生产出来交由商队沿途交易的货物还包括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丝绸、羊毛、棉织品、地毯、挂毯和帷幔，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象牙和布料，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皮

⁵⁶ Marco Polo, 1974: 80~82。

⁵⁷ Soucek, 2000: 123。

⁵⁸ Inalcik, 1994: 218。有证据显示在蒙古征服后，中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生丝供给被以大不里士为基地的伊朗供给取代（Inalcik, 1994: 219），但相关证据不完整。

⁵⁹ Liu Xinru, 2010: 107。

⁶⁰ Inalcik, 1994: 219。

草。⁶¹ 此外，中国开始在这个时期沿着丝绸之路出口茶叶。⁶²

从九世纪直到 15 世纪，中亚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该地区产生了才智超群的伟岸人物，在数学、天文、地理、医药和哲学方面取得了根本进步，包括花拉子米（783~847 年）、法干尼（798~865 年）、花拉扬迪（al-Khwarajandi，11 世纪）、比鲁尼（973~1048 年）、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 年）和库奇（al-Quschi，1402~1474 年）。中亚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是兀鲁伯·贝格（1394~1449 年），他是“河中地”的实际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了无数成果，他有名的事迹包括在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兴建了一所引人瞩目的伊斯兰学校，还有在撒马尔罕的近郊修筑了一座天文台。他分类记录了 1108 颗恒星。在元朝统治下，中国的蒙古族统治者大量任用来自中亚的科学家。忽必烈可汗将中亚的医生请入皇宫，并下令将伊本·西那的《医典》译成中文，印度医学界也使用这本《医典》，该书还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大学作为基础医学课本使用，直到 18 世纪。元明两朝大量任用来自中亚的天文学家，于是出现了“天文学丝绸之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在中国的天文学中起了重要作用。明太祖于 1368 年在传统的司天监之外另设回回司天监，由来自布哈拉的札马鲁丁担任监令。⁶³ 中亚的天文研究被译成中文，穆斯林天文学家制造了一座观星盘，于 1385 年安装在南京的观星台上，用来观测恒星。

传统的技术主要使用骆驼载货，沿丝绸之路运输货物成本昂贵，于是海上贸易的发展逐渐超过了陆路。丝线和织品的价值重量比很高，但随着中国瓷器、茶叶以及后来棉织品在几百年来出口

⁶¹ Stierlin, 1998: 60。

⁶² Liu Xinru, 2010: 109。

⁶³ Starr, 2013: 452~453。

增加，与西域交易时与其走陆路穿越中亚，还不如走成熟的航线由东南亚穿越南海更有优势。16世纪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贸易迅速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亚陆路的沿途贸易就绝对减少了。

16世纪，中亚的帖木儿王朝被昔班王朝取代。16~17世纪，该地区“似乎经历了一段繁荣和增长的时期”。⁶⁴ 18世纪和19世纪初，希瓦、布哈拉和浩罕分别由不同的可汗统治。海路贸易增加，与此同时，受到与中国、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交流的刺激，陆路贸易也保持了活力，一直到18世纪。⁶⁵

明末（1368~1644年）清初（1644~1911年），中国庞大的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商业发展和繁荣，刺激了通过新疆与中亚的贸易持续开展，18世纪的新疆再次被置于中国的直接统治下。17~18世纪，印度北部和中亚之间的贸易发展壮大。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需要大量中亚的马匹，中亚则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进口棉花、棉织品和染料。印度的莫卧儿统治者“修建了数百座桥，开设了数百家驿站，保护了最重要的贸易路线”，由此刺激了与中亚贸易的增长。17世纪晚期，布哈拉可汗经常与莫卧儿统治者交换外交信件，要求对方采取措施确保商人在贸易路线上的安全。⁶⁶

16世纪后，俄罗斯帝国的东部扩张刺激了俄国人对在南亚生产、通过中亚交易的货物的需求。浩罕汗国统治下的费尔干纳山谷在此期间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在整个18和19世纪，越来越多的大批俄国货物被从奥伦堡带到浩罕汗国（1709~1876年），⁶⁷ 数千浩罕商人再将这些货物运到天山那边的喀什、叶尔羌和其他新疆城市，很

⁶⁴ Soucek, 2000: 150。

⁶⁵ Levi, 1999。利维的研究为了解中亚经济史上研究不足的时期带来了新的曙光。

⁶⁶ Levi, 1999: 528~530。

⁶⁷ 浩罕汗国的根基在塔什干和费尔干纳山谷。

大一部分货物又从这里被运到更远的中国和印度市场。浩罕商人带着茶砖、丝织品、瓷器、银器和大黄（医用或染色）等中国货物回到费尔干纳山谷。”节节上升的俄国需求刺激了塔什干和费尔干纳山谷的发展，为了出口到不断增长的俄国市场，浩罕汗国投资灌溉系统来刺激棉花生产的发展。⁶⁸

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好纽带。满载着两国商品和旅客的船队往来其间，互通有无，传递情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对来自爪哇的奇珍异宝有着形象描述，而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则陈列了大量中国古代瓷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的演讲，2013年

经济地理

中国的内部贸易和商业化从历史早期就得到了高度发展，总值

⁶⁸ Levi, 1999: 540~541。

始终远远超过国际贸易的总值。国际贸易在一些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最明显的是在明朝初期。在 1757~1842 年的清朝，欧洲商人只能通过广州交易。不过除了这些限制，在中国史上大部分时期，中国在南海沿岸以及穿过南海进行的国际贸易持续开展，相对畅通无阻。尽管南海贸易的总值与国内贸易相比相形见绌，但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南海地区包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和海南省、台湾、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从历史角度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单一地区：“（南海）因其本质近似地中海而不同寻常。它从东北角到西南角的主要贸易航线处于两次季风的路线上，因此特别适合季风时节出航。”也许能将亚洲东西之间的贸易叫做“亚洲东西部的商品交易和思想交流”，南中国海是其主要的贸易路线：“它是第二条丝绸之路。它的水域、岛屿和海峡就像是中亚的沙漠和山口；它的港口就像是驿站。它对中国南方人的意义就像玉门关以外的土地对中国北方人的意义一样。”⁶⁹

古代和中古时代

从中国穿过南海抵达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路线有着悠久历史。罗马帝国时期，中国与西域之间的海上贸易通过巴巴里肯和巴利加萨这些印度港口与中亚的路线连接起来，商人既包括阿拉伯人，也包括罗马人。罗马人甚至在印度东南海岸的波杜卡修筑了一个货栈，他们建造了仓库、商品加工作坊和船坞。⁷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贸易到汉朝时（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已经高度发达，

⁶⁹ Wang Gungwu, 1998: 3~4.

⁷⁰ Liu Xinrui, 2010: 40.

在唐朝时（公元 618~907 年）大幅扩张，在宋朝时（公元 920~1271 年）继续增长到更高水平。

中国船只自历史早期以来就在整个南海和南海以外开展长途贸易航行，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商人就可能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和东非。中国船只约在公元 350 年航行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约在公元 400 年之前航行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到四世纪可能抵达了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口，停靠在亚丁湾。⁷¹ 东非海岸有大量中国钱币，最早的可追溯到约公元 620 年，东非还有成堆的中国瓷器碎片。1955 年，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写到：“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基尔瓦群岛的这两个星期，我见到的中国瓷器碎片数量之多，竟是以前从未见过的，简直可以用铲子来计量。我想可以公正地说：就自公元十世纪起的中世纪而言，坦噶尼喀埋藏的历史写在了中国瓷器上。”⁷²

中国在公海的悠久贸易史，尤其是穿越危险南海海域的历史，刺激了海洋科技的进步。中国领航员率先在海上使用磁罗盘：“这一水手艺术的伟大变革引领了定量导航的伟大时代，到公元 1090 年被中国船只确证有效，约一百年后首次在西方出现。”不过可以肯定，磁罗盘在用于海上之前在中国早已用于风水，而且中国船只最初使用磁罗盘的日期可能早到公元 850 年。⁷³ 船艏柱舵轮对横渡公海的长途航行极其重要，在欧洲的最初应用是在 12 世纪晚期，不过“它在西方出现之前早就”就在中国使用了，也许早到公元五世纪，似乎可能是阿拉伯商船采用后将它传到西方。磁罗盘和艏柱的使用对葡萄牙的海上探索极为重要。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国的船只就首先运用了水密舱的原理，但西方船只直到 18 世纪末才采用，按

⁷¹ Needham, 1970: 41~42。

⁷² Mortimer Wheeler, 引自 Needham, 1970: 51。

⁷³ Needham, 1970: 44、48、247。

此制造的舱壁结构在船身进水时提供了船舱不被淹没的可能。中国船只至少从三世纪起就采用了多桅杆，而欧洲船只仅在 15 世纪才采用了“有三个以上桅杆的全帆”多桅系统。⁷⁴

早在唐朝，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就聚集着大量外国商人和水手。一位 750 年到访广州的来客发现港湾有无数南亚、孟~高棉（昆仑）和“波斯”（即来自中东）的远洋船只，有些是大型船。它们装载的药品、香料和贵重物品“堆得像山一样高”。来自锡兰、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的不同种族的商人和水手要么在这里短期停留，要么在这里长期居住。722 年，据说这些大型外国船只中有 40 艘每年抵达广州。879 年广州被黄巢叛军洗劫时，阿拉伯人的记录显示 12 万外国人遭到屠杀，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摩尼教徒。⁷⁵ 尽管这个数字似乎被严重夸大了，不过也说明即使在这么早的时期，在华外国商人的数量有多大。

从罗马时期直至 14 世纪，阿拉伯商人主宰了从东南亚横跨印度洋的贸易。⁷⁶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们对横跨南海的贸易也很重要。印度人、波斯人和来自东南亚本身的商人在横跨南海的贸易中也起到了作用。不过，中国商人在贸易中起着中心作用。早在至少 13 世纪，由中国人建造、中国船员操纵、载着中国贸易商的船只组成了南海贸易的重要部分。⁷⁷ 16 世纪第一批欧洲人与中国开展贸易时，正逢“大部分由中国人进行的”横跨南海交易的蓬勃发展：“源自蒙古时期或可能早得多的本土中国人的商业扩张，为欧洲从海上入侵中国铺平了道路。”例如，马尼拉在西班牙的统治下繁荣发展，

⁷⁴ Needham, 1970: 253~261、66~67。

⁷⁵ Twitchett and Stargardt, 2002: 47~48。

⁷⁶ Needham, 1970: 42。

⁷⁷ 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 46。

主要因为它是中国和美洲之间的中转站。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完全是由中国船只和商人开展的。⁷⁸ 大量证据表明，19 世纪早期中国与马来西亚有着活跃的“平底帆船贸易”。

中国出口南海的主要传统产品是丝绸，但瓷器和茶叶在唐宋两代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从南海以外的地区进口各种产品，不仅包括来自东南亚的，还包括来自波斯、叙利亚、阿拉伯、东非和印度北部的产品。中国南方城市扬州、广州、宁波和温州是南海交易中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很多专家认为（福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⁷⁹ 可以说直到至少元朝，南海交易最重要的港口是泉州。确实，有些学者认为 10~14 世纪的泉州理应被贴上“世界大型商场”的标签。⁸⁰

最近在塞丁普拉对马来半岛的考古研究，为了解公元 1000~1400 年横跨南海的贸易性质带来了新的曙光。⁸¹ 塞丁普拉是一个源自公元五世纪左右的知名王国，从八世纪或九世纪开始处于苏门答腊东南的室利佛逝 / 三佛齐王国的影响之下，甚至可能被其征服。塞丁普拉在整个南海的贸易以及前往印度洋的中转贸易中有着特别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处于克拉地峡的东部、马来半岛的狭长颈部。克拉地峡在此处只有约 70 公里宽，一条大湖延绵伸展，占了地峡约三分之一的宽度，因此从这条湖到印度洋的陆上距离只有约 40 公里。至少从七世纪开始，塞丁普拉与泰国湾整个地区就有着贸易往来。自十世纪中期以来，来自中国的陶瓷残片越来越密集，从这个时期直到

⁷⁸ Fairbank 和 Teng, 1941: 202)

⁷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指定泉州是终点。

⁸⁰ Schottenhammer, 2001。

⁸¹ Stargardt, 2001。这一出色的研究是思鉴 (Janice Stargardt) 博士对在新加坡多年实地考古工作的总结。

至少 14 世纪晚期，塞丁普拉在不断壮大的跨地区贸易网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张贸易网连接了中国南部、东北亚、苏门答腊，并通过跨越克拉地峡的货物转运与印度洋相连。

塞丁普拉是近代最早采取公共行动来提供公用商品的杰出例子。塞丁普拉王国开凿了一个交通运河网络，意味着货物可以走水路穿过克拉地峡的大部分地区，这是批量运输最便宜的方式，运河网络建设的最终阶段于 11 世纪完成。看来塞丁普拉的统治者优先修建横跨克拉地峡的交通运河，甚至将灌溉和本地运输所用的运河置于其次。从南海穿过克拉地峡将货物运到印度洋的距离缩短了约两千公里。⁸²

在东南亚的所有考古遗址中，塞丁普拉到目前为止拥有的中国瓷器碎片最多。尽管整片遗址能被发掘的只有一小部分，但发掘出的物品中仅是公元 1000~1400 年的中国陶瓷碎片就有五万块。除了大量陶瓷，很可能还有大量丝绸和茶叶通过塞丁普拉进行贸易，不过埋在地下的丝绸和茶叶没法保存一千年，陶瓷碎片则可以。这些陶瓷大部分品质上佳，价值重量比相对高，主要来自中国南方的少数几个窑炉。遗址发现的所有中国陶瓷碎片中有 45% 来自浙江龙泉窑，龙泉窑陶瓷是“当时最精美的陶瓷之一”。剩下的大部分来自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德化。这么多从中国出口的优质陶瓷的存在，反映出中国商业的出色组织水平：“这些优质陶瓷反映了对于塞丁普拉作为中转港口的特定要求，也体现出它所隶属的贸易网络。表明中国的陶瓷业和国内贸易的组织能力高到足以适当装船来满足这一需求，也足以长期保持。”⁸³ 维持这个出色体系的中国商业社区有可

⁸² Stargadt, 2001: 338。

⁸³ Stargadt, 2001: 344、356。

能在泉州和广州都有。

其他考古资料可以补充在塞丁普拉的研究，包括在泉州发现的一艘宋朝末年从事南海贸易的船只残骸。⁸⁴ 由于船只沉没时的独特状况，船上所装的南海热带焚香和其他贸易产品保存了下来。这艘船当时正从南海返回，带着各种木质产品，包括 2400 公斤的焚香木材。修复这艘船得出的结论是它在东南亚海域逗留了一些较长的时期。到 12 世纪，东南亚已经出现了泉州商人的半定居区甚或完全定居区。从塞丁普拉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有可能包括来自马来半岛不同部分的四大类林木产品。首先是产自芳香木材、树脂和树脂晶石的焚香产品，包括两块上好乳香，两块上好樟脑和一块中等质量的焚香，焚香在中国的销量很大；其次是药材；第三类是致命毒药；第四类是造船用的木材密封胶、索具、绳索、填料和浮标。“高级焚香的交易价值巨大”：“南方异域货物的总数庞大”，为了支付进口货物的费用，需要大量出口中国的优质陶瓷。⁸⁵

在雅加达以北 150 公里处的印坦发现并挖出了十世纪的中国沉船，为了解传统南海贸易的范围带来更多曙光。看来这艘船正从广州返回，船上装着各式中国陶瓷，产地遍布中国各地。“在中国境内为长途航行到南海的船只组装一船货物涉及到复杂的内部营销和运输流程，（地理跨度广泛的不同产地）为了解这些流程提供了宝贵洞见。”船上的货物还包括中东的玻璃器皿，更重要的是包括大量沉甸甸的银锭，价值等于宋朝政府从整个中国取得的全部年度财政收入的 1.15%。⁸⁶ 这艘沉船形象地说明：中国船只横渡南海在中国、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之间开展的长途贸易，具有整合度

⁸⁴ 船只残骸在泉州海洋博物馆展出，格林 (Green, 1983) 提供了相关信息。

⁸⁵ Stargardt, 2001: 373、358、364~365。

⁸⁶ 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 27。

高和规模大的特征。

近代早期

15 世纪，中国政府在 1405~1433 年组织大型船队七次出使从婆罗洲到东非的地区，船队全部由郑和指挥。郑和出生于云南一个穆斯林家庭，其父曾到麦加朝圣。第一次下西洋包括 62 艘大型帆船，带领一支约三万人的队伍。第一站是马六甲，接下来的一站是苏门答腊的巨港，这座城市“早被中国人所知”。郑和抵达前 30 年的 1377 年，一位在广东南海县土生土长的中国海盗头子梁道明控制了该城市：“这是印尼或马来西亚有大批中国人的最早标志之一。”尽管巨港并不是明朝的殖民地，“但在将近两百年中仍然处于中国的控制下。”船队随后穿过印度洋抵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后返回中国。第二次下西洋是在 1405 年，抵达爪哇、古里、锡兰和暹罗。1409 年第三次下西洋走了相似的路线。头三次下西洋到访了南海周边和印度洋中的地区，这些地区“早被中国航海员熟知”。印度南部城市的繁荣“部分是因为它们是来自西域的阿拉伯船只和来自东方的中国船只的会聚地”。⁸⁷ 后四次下西洋行程远得多，到访了霍尔木兹、波斯湾和马尔代夫，并覆盖了包括摩加迪沙和莫桑比克在内的整个东非海岸。

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加深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同时“向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国王和苏丹展示中国作为亚洲领先的政治和文化之国的力量和荣耀”，“诱导他们承认中国皇帝的名义宗主地位并向中国宫廷派遣进贡使团。”这些由远洋平底帆船组成的大型船队规

⁸⁷ Fitzgerald, 1972: 95~97。

模比同期欧洲船队大得多，很多船重至少 1500 吨，而 1488 年巴托罗缪·迪亚斯环绕好望角时的船只仅重三百吨。尽管郑和的船队装备有火枪等武器，而且船只规模巨大，但并未企图建立外国要塞或殖民地。整个行动是“海军对外国港口的友好访问”：“确实，几乎无法用海军这个词来描述中国船队，它们更像是商船队的集合，而不是一个国有化的贸易管理机构。”⁸⁸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郑和下西洋后“变得内向”，中国的海上贸易大幅缩减。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式“工业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外贸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大幅缩减。不过，郑和的船队是政府官方的远征，与中外商人跨南海运货开展的长期贸易没有直接关系。到 18 世纪中期，中国与东南亚和欧洲的海上外贸都大大增加，中国平底帆船的规模比欧洲相应船只的规模更有利。中国最大的平底帆船可能有一千吨，载有 180 名海员：“成百上千的这些牢固商船每年定期从厦门或广州往返马六甲海峡，冬季在南方，夏季在北方。它们遵循详细的航路指南，沿途经停无数港口。所谓的‘西’线沿着越南、暹罗和马来半岛的海岸前进……‘东’线将船只带到马尼拉、摩鹿加和爪哇。与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的船上持续进行……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⁸⁹

此时江南大部分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1815 年江南的人口约为 2600 万，⁹⁰ 而中国的人口总额约为 3.3 亿。相比之下，1820 年欧洲的人口约 1.9 亿，包括法国的 3200 万、德国的 2500 万和英国的 1400 万。⁹¹

⁸⁸ Needham, 1970: 50~53.

⁸⁹ Fairbank, 1965: 73.

⁹⁰ Li Bozhong, 1986.

⁹¹ Cipolla, ed., 1973: 74.

到 16 世纪晚期，纺织业成为江南产业经济最大的一个部分；到 17 世纪末，江南是世界最大的织物和纤维出口地，商业化和城镇化程度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南京是丝绸业中心。19 世纪 40 年代，近 20 万人从事丝绸业，织机超过 3.5 万台。⁹² 松江县是交易类棉布生产最发达的中国地区。苏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到处都是布料商人，也是染料中心”。⁹³ 清朝时，江南生产的交易类棉布约有 90% 出口到中国其他地区或海外。18 世纪，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对欧洲的出口：1786~1798 年，出口到西欧和美洲的“南京布”（在南京和江南其他地区织的布）增加到几乎五倍。18 世纪早期，约有五千艘远洋船只的基地在南京，吨位是 1700 年所有类型英国轮船的 2.8 倍。⁹⁴ 18 世纪晚期，据载仅上海和乍浦的港口就有约五千艘远洋船只，总重估计约为 55 万吨。据载每家大商户都拥有自己的船队，每支船队的船只超过一百艘，雇用超过两千人。⁹⁵

15 世纪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表明中国的技术和文化比他到访的地区（包括东南亚）优越。不过，尽管中国与东南亚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中国并未试图殖民南海周边的地区。中国拥有优越的技术和庞大的规模，想要殖民完全可以，但中国的领导者选择将重心放在治理自己的国家上。

随着时间推移，华人社区在南海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中国人去这些地区主要是为从事与贸易相关的活动。到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海上贸易和中国人向东南亚港口的迁移流动已经呈现重要规模。”早在欧洲船只进入南海之前，“中国的平底贸易帆船是东亚国

⁹² Li Bozhong, 1986: 21.

⁹³ Xu Dixin 和 Wu Chengming, 2000: 171.

⁹⁴ Li Bozhong, 1986: 27、53.

⁹⁵ Xu Dixin 和 Wu Chengming, 2000: 364.

际商业的主要载体。”与欧洲商人后来的活动不同，中国商人在南海周边地区的活动“很少得到中国政府的海军或政治行动的支援”。⁹⁶ 海外华商社区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成“没有帝国的商人”。⁹⁷

16 世纪，苏门答腊的华商社区比葡萄牙的大得多。在苏门答腊的主要胡椒港口占碑，中国人是商界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来自暹罗、爪哇和马六甲以及荷兰、英格兰和中国的船长打交道。爪哇西端的万丹港有一个“胡椒贸易的重要华人中间商社区”。有些华商参与当地的海上贸易，有些则提供经纪业务和其他商业金融服务。占碑的苏丹在政府服务中使用华人经纪商、译员和过秤员。⁹⁸

据记载，17 世纪有超过一万中国人在暹罗居住，其中 3~4 千住在首都大城。由于在曼谷本地容易得到柚木，曼谷发展成为制造中国式平底帆船的世界最大中心。中国与暹罗的贸易在 17 世纪迅速增长，船主和船长主要是中国本地人。⁹⁹ 18 世纪晚期的暹罗国王有一半中国血统，是一位潮州（广东东部汕头）商人的儿子，他收留了主要来自潮州的中国移民。1767 年曼谷成为暹罗的都城时，超过一半的人口是中国人。¹⁰⁰ 今天潮州有约三千万人口，其中约一半住在南海周边地区，主要在泰国。他们有自己的方言和金融网络，外人很难渗透。

宁波自至少唐朝以来就与东南亚（和东北亚）有着深厚的商业关系，制造产品的原料有一大部分从南海和中国其他地区进口。用进口材料在宁波制造的产品包括船只、家具、木雕、漆器和纸张。¹⁰¹ 宁

⁹⁶ Fairbank, 1965: 423、29。

⁹⁷ Wang Gungwu, 1990。

⁹⁸ Curtin, 1984: 170。

⁹⁹ Curtin, 1984: 168~171。

¹⁰⁰ Fairbank 和 Reischauer, 1965: 459。

¹⁰¹ Shiba, 1977: 430~431。

波繁荣的中国境内地区间贸易大量依靠与传统地方银行（钱庄）合作的本地商人网络。18~19 世纪，宁波人除了移居到中国其他地区外，在海外东南亚的侨民区也发展起来：“19 世纪海外的宁波商人以‘宗族情节’和对原籍地忠心不二著称。”¹⁰²

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不受中国政府保护，不断遭到袭击。例如从 1565 到 1815 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地与在中美洲的殖民地之间的跨太平洋贸易兴旺发达，中国商人用中国的平底帆船将中国货物带到马尼拉，他们带去中国丝绸、瓷器和名贵家具，换回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矿山开采的银块。马尼拉的华人社区大规模发展，除了商人和水手，还有从事各种职业的各类华人。到 1586 年，马尼拉估计有一万华人。1603 年，西班牙军队加上菲律宾本土人和日本军队估计屠杀了约两万华人。¹⁰³ 华人数量迅速再次增加，但 1639 年又发生了一次屠杀，估计有 2.3 万华人遇害。1686 和 1763 年再次发生屠杀。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东南亚华人的数量在欧洲殖民统治下快速增长，包括一大批为了在橡胶园和矿井工作而移民的穷人。今天，南海周边各国可能有多达 4~5 千万华裔，每个国家都有一小部分华人占据商业结构的重要部分，¹⁰⁴ 还有为数多得多的华人从事各种普通职业。

¹⁰² Shiba, 1977: 437。

¹⁰³ 详见 Borao, 1998。鲍晓鸥的研究特别有用，因为它借用了中国政府自身开展的详尽调查。这一调查在试图了解暴力发生的原因时极为客观，没有为华人社区开脱责任。中国政府的调查为了解海外华人社区（不论贫富）与其所居住的东南亚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带来了明亮的曙光。对东南亚华人社区的反复袭击，包括 1960 年代在印尼的袭击，使得仔细研究以找到根本原因成为必要。

¹⁰⁴ 对南海周边经济体中海外华人的重要程度有各种不同的估计。

中国与南海的长期关系¹⁰⁵

西方评论人员普遍认为，中国最近才开始主张在南海的权利，而且主要与南海海底可能储存的大量油气相关。不管怎么看待中国主张的法律效力，也不管南海争议可能怎么解决，中国对其在南海权利的观点自古就有，远远早于迄今最近在海底发现能源的日期，与中国商人跨南海将货物从中国南方港口运往东南亚港口的悠久历史紧密相关。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对一个与国家本土相距甚远的地区主张司法管辖权是异乎寻常的。事实上，国家在远离本土的领土拥有司法管辖权一点都不反常，在很多例子中，这些领土与相关国家的距离比南海与中国本土的距离远得多。

以前没有现代地图和导航辅助设备，用传统的航运技术在南海航行极为危险。南沙（斯普拉特利）群岛由多达四百个岛屿、岩礁、暗礁、环礁、堤岸和浅滩组成，其中没有一处可以永久居住。西沙（帕拉塞尔）群岛由 20 多个岛屿、岩礁、暗礁、环礁和浅滩组成。国际司法法庭的观点是“即使是不显著的主权展示”也能对“遥远或几乎无人居住的领土”确立主权。¹⁰⁶ 全世界没有几个领地的特点能比南海群岛更适合叫做“遥远”或“无人居住”。除了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南海群岛的大部分是无法居住的。

中国船只横渡危险的南海海域已超过 2000 年。中国到汉朝甚或更早时期已在制造大型远洋船只。西汉（公元前 206 年~公元 8 年）统治者与东南亚、斯里南卡和印度建立并维持了紧密的航海和商业关系。西汉使节使用穿过南沙群岛的海上路线，而不是传统的沿岸

¹⁰⁵ 这部分大量依赖申建明（2002）的细致研究。

¹⁰⁶ 《对西沙哈拉地位的咨询意见》，1975 年。

路线，这减少了几个月的旅行时间，但能做到这点是因为详细了解了南海海中和海底的障碍物。后世要么继续利用以前开发的航道，要么开发新航道来进一步缩短中国大陆与南海海中和海外目的地之间的航距。郑和跨南海下西洋的航道早被中国海员所知并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自宋代以来被归纳成两大航线：东海线和西海线，每条海线又再分为一条主线和一条副线。

来自广东、海南和其他沿海地区的中国渔民许多世纪以来将南海作为捕鱼基地。渔民经常将南海群岛当成遮蔽处或停靠点，有些甚至在岛上种植农作物。1868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提到海南岛渔民的足迹“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每个小岛上找到，有些渔民甚至会在岛上住较长时间。”¹⁰⁷

从不迟于汉朝开始，中国就认为南海及其岛屿属于自己管辖和控制之下。唐朝时西沙和南沙被归于琼州县（今海南省）管辖。明清中央政府都“始终认为自己以南中国海群岛及其毗邻地区拥有主权”。¹⁰⁸从北宋（960~1127年）至清朝，广东省、海南及其下属行政县郡的各种官方记录始终确认：中国有意也确实对南沙和西沙群岛及其毗邻海域行使了司法管辖权。

在越南北部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年代（公元前111~公元938年），中国海军经常在南海巡逻。中国海军在元、明、清朝继续在南海巡逻。明朝关于琼山县（海南岛）的官方记录写到：“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50艘，巡逻海道几万里。”¹⁰⁹

早在宋朝，中国地图就已将南海群岛作为中国境内地区包括进

¹⁰⁷ Shen Jianming, 2002: 130.

¹⁰⁸ Shen Jianming, 2002: 130~133.

¹⁰⁹ Shen Jianming, 2002: 125.

来。元、明、清朝的官方地图始终将南海群岛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932、1935 和 1947 年，国民党政府对南海开展了三次大规模勘察。1948 年的地图包括大部分南海岛屿的标准化名称，并采用了著名的 U 型虚线来指明中国对南海的主权。1949 年后的中国政府在官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中继续沿用这种做法。¹¹⁰

1951 年，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跟东沙和中沙群岛一样，始终都是中国的领土。”¹¹¹ 1958 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西沙和南沙群岛跟东沙和中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992 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1996 年，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重申中国在 1992 年《领海及毗连区法》中提出的对各群岛的主权和权利。

三、西方殖民主义与丝绸之路

西欧殖民主义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关系在远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基本和

¹¹⁰ 即使在中国境内对南海周围“虚线”的确切含义也有争议。有人认为这适用于中国对虚线以内整个地区的主权，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主权只适用于岛屿和有岛屿特征的地区 (Sheng Jianming, 2002: 122~129)。

¹¹¹ 译者注：中文译自英文。东沙（普拉塔斯）群岛位于香港东南 340 公里处。中沙（马科斯菲尔德沙洲）群岛位于东沙群岛西南和西沙群岛东部。

平，来自中国、阿拉伯国家、印度和东南亚的船只大多都不携带枪炮。这些船只从东非到中国南方所停靠的港口都很国际化，多种文化并存。在印度洋和南海的各个港口，穆斯林、佛教、儒家文化、拜火教、基督教基本上和谐共存。在商人开展贸易的那些地方，政府大都尽力发展贸易，认为贸易对于社会有利。由郑和率领的中国探险船队，就是这种和平关系的最高形式。郑和船队最后一次下西洋是 1433 年。

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的时候，欧洲生产的商品很少能让亚洲人产生购买欲望。瓦斯科·达伽马 1498 年第一次去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明代古籍称“古里”）时，拿出了他们带去的条纹布、兜帽斗篷、帽子、珊瑚串、洗手盆、糖、油和蜂蜜等商品。国王看了后嘲笑葡萄牙人，建议他们不如拿黄金交换。据估计，1750 年时，西方（即欧洲）的产值仅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 18%。相比之下，南亚占 24%，中国占 33%。直到 18 世纪末，中国的技术几乎在每个方面都领先于欧洲或者至少与欧洲相当。有一个方面欧洲的技术毫无疑问优于亚洲，那就是军事。15 世纪和 16 世纪，欧洲经历了陆地和海上的军事技术革命。引发军事技术革命的是新兴欧洲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对立，这些国家在现代初期开始成形，在 17、18 世纪的“绝对主义时代”羽翼渐丰，在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继续发展壮大。¹¹²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航海之后没过几年，葡萄牙人就绕过了好望角。欧洲的区区小国葡萄牙，是欧洲暴力入侵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不可否认，与印度洋上那些没有武器的穆斯林船只

¹¹² 基根（Keegan, 1976）以图像展示了互相激烈竞争的欧洲国家如何“实现”军事技术的长期革命，他在书中比较了阿金库尔特战役（1415）、滑铁卢战役（1815 年）和索姆河战役（1916 年）中军事杀伤力难以置信的技术“进步”。

相比，葡萄牙舰船的武器相对更加精良；欧洲侵略者又有着其亚洲对手所不具备的顽强意图，这更强化了葡萄牙的优势。”¹¹³ 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洋，“使得和平航海系统这一该区域过去极其突出的特征戛然而止。”¹¹⁴ 郑和率领的船队与葡萄牙船队之间的对比“确实是天壤之别”：“中国的整个做法是海军友好访问外国港口，然而对比之下，葡萄牙在东苏伊士几乎是立即发动了全面战争。”只要葡萄牙人是沿非洲西海岸下行，他们的活动相对是比较受限的，当然除了奴隶：“1500年之后，欧洲的海军已经有实力先后向东非阿拉伯国家、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恐怖主义战争；唯有到了那时，欧洲海军的力量才显示出他们究竟能做到什么。”葡萄牙“大力传扬十字军心态，并将其运用到海军征服整个南亚的活动当中。”¹¹⁵ 16世纪末前，葡萄牙沿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岸向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都发动了战争。到16世纪末的时候，葡萄牙已经沿海上海丝绸之路建立起了一系列势力范围和堡垒，其中包括莫桑比克、霍尔木兹、果阿、科伦坡、马六甲和澳门。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得到了当时国王的大力支持，这位国王自诩为“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及印度之征服、航海与商业之王”。¹¹⁶ 葡萄牙君主希望通过扩张，不仅达到让那些不信奉天主教的人皈依天主教这一宗教目的，还在经济上获益。

此后，葡萄牙遭到荷兰、法国和英国这些更加强大的欧洲对手的挑战，并且被打败。17世纪，这些国家都建立了由国家支持的武装“东印度”贸易公司，引领它们在亚洲的扩张。接下来，这些国

¹¹³ Chaudhuri 引用 C.H.Boxer 所言，1985: 77~78。

¹¹⁴ Chaudhuri, 1985: 63。

¹¹⁵ Needham, 1970: 53。

¹¹⁶ Fairbank, 1965: 18。

家之间又激烈争夺对亚洲和西方之间海上贸易的控制权，它们在海外的暴力冲突在欧洲内部也同样上演。到了 18 世纪末，英国确立了其对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1858 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威斯敏斯特（指英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正式确立了英国的控制权。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继欧洲大陆和北美工业化之后，西方国家之间爆发了新一轮的对立冲突。这对南海海域的土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到 1900 年前后，英国在包括新加坡和沙捞越在内的马来半岛确立了殖民统治，法国、荷兰和美国则分别在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建立了殖民统治。也是到 1900 年时，按照“不平等条约”，那些在南海贸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国南方主要港口城市都被迫对西方开放，让西方人居住和经商。这些城市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汕头和上海，还包括香港，香港在南海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直到 1997 年都是英国殖民地。

1890 年，军事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所著的影响深远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出版。他提出，海权对于国家实力和繁荣的增长必不可少。他认为应该的海外力量不仅取决于它与欧洲大陆不接壤的有利地理位置，还取决于它在国外刻意获得的战略关键基地。这使得英国能够在世界最脆弱的节点控制世界航运。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亚丁、新加坡和好望角都证明了这一点。马汉的最终目的是转变他的美国同胞。如果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并相应采取行动的话，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海军强国，或许会是海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通过控制大片公海，有压倒一切的海上控制权，就能封锁商船进出敌人海岸的要道，只有最强大的海军才能做到。”¹¹⁷ 1916 年前，所有主要国家竞相建立强大舰队，

¹¹⁷ Mahan, 1890: xxxii。

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马汉的观点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1901~1909年），美国大幅扩建了海军。1907~1909年，由16只巨大的战舰和辅助舰组成的“白色大舰队”环球巡航14个月，在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锡兰、埃及和地中海宣示美国海军的崛起。

西方列强不仅在南海各岛殖民，还在太平洋更广地区建立了殖民地。此时北美洲主要被白人占领，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暴力征战（其中包括对印第安土著的大屠杀）打遍这块大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通过几乎灭绝土著人口，确立了白人的殖民统治。太平洋大部分重要岛屿属地都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管辖之下。美国还吞并了夏威夷群岛，从俄罗斯手里买下了巨大的阿拉斯加属地（其中包括绵延北太平洋一千公里的阿留申群岛）。到了1900年，日本夺得了对独立小国琉球的控制权，琉球此前数百年都是中国的附属国，这时被迫并入日本，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俄罗斯殖民主义

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16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吞并了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俄罗斯版图横跨西伯利亚，1649年扩大到太平洋，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1730年到1848年，俄罗斯吞并了哈萨克斯坦北部。1864年，俄罗斯开始了对中亚核心地带的最后征服，先后征服了塔什干（1865年）、布哈拉（1868年）、希瓦（1873年）、浩罕汗国（1876年）和梅尔夫（1884年）。这一整片区域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按“东突厥斯坦”这一单独实体管辖。俄罗斯在中亚扩张之时，正值19世纪清朝灾难性地衰落，其中包括满清在新疆统治的崩溃。在俄罗斯帝

国和苏联时期，从欧洲直至太平洋的大片广阔土地自蒙古帝国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亚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建立“突厥斯坦自治国”运动，主张有自己的军队、外交政策和财政，并且统一中亚各民族。1920~1924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拒绝了这一提议，开始了在苏联内确立单独“共和国”的漫长划分过程。¹¹⁸ 苏联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找出了单独的文化和语言群体，形成了在每个中亚“共和国”划定边界及强化各自“国家身份”的基础。这为后来中亚解体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些独立国家而奠定了基础。¹¹⁹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向南推进，从西伯利亚进入大清帝国的疆域阿穆尔州。根据《北京条约》（1860年），俄罗斯控制了阿穆尔河以北地区以及乌苏里江与太平洋之间的沿海省份，这些省构成了东北的东海岸。该地区的主要城市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1891~1916年，俄罗斯帝国建造了穿越广袤草原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且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修建了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时，东部终点就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苏联时期，中亚的铁路线更加密集，使该地区紧密地融入了苏联经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

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革命性”的一部法律——《联合国公约

¹¹⁸ Soucek, 2000: 第16章。

¹¹⁹ 苏联领导人阻止建立统一的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方式，与英法在一战末时阻止在中东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方式颇为相似。法、英、俄签订的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了这一安排，俄罗斯革命后，托洛茨基披露了这个协定。

海洋法》（UNCLOS）。根据这项立法，允许各国在距自己海岸两百海里建立起“专属经济区”（EEZ），有权通过海岸警卫队舰队进行巡逻和保护。根据这部法律，西方的前殖民列强都可以保留对各自遥远属地的管辖权，这些属地往往人烟稀少或无人居住。英国的海外领地包括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圣赫勒拿岛、阿森松岛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这些都在大西洋；还有英属印度洋领地和皮特凯恩群岛，以及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在内的加勒比海各属地。法国的海外领地包括克罗泽群岛、凯尔盖朗群岛、圣保罗和阿姆斯特丹岛、留尼旺和特罗姆林岛等，这些都在印度洋；另有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瓦利斯和富图纳、克利珀顿岛，这些都在太平洋；还有包括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岛在内的加勒比海和中美洲领地。美国的领地包括夏威夷、关岛、美属萨摩亚、北马里亚纳群岛、鸟粪群岛和威克岛，全部都在太平洋。中国无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只有 90 万平方公里，如果在南海的一切争议都取胜的话，中国总共的专属经济区还不到三百万平方公里。法国的海外专属经济区面积达 1070 万平方公里，而美国（包括阿拉斯加在内）是 980 万平方公里，俄罗斯是 670 万平方公里（即其太平洋和西伯利亚属地），英国是六百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为 260 万平方公里，新西兰是 330 万平方公里。¹²⁰ 仅在太平洋，前殖民列强的海外专属经济区总面积就有 3090 万平方公里，比中国无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大 30 多倍；如果中国在与邻国围绕南海的一切争端中获胜，那么就比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最大可能面积大十倍。

¹²⁰ Nolan, 2013 年。

四、中国、丝绸之路与世界

丝绸之路与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自古就已经存在，甚至在秦朝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207 年）之前就已出现，¹²¹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晚期。琉球（冲绳）最后一次派出朝贡使团是 1875 年，¹²²安南最后一次派出朝贡使团是 1883 年，朝鲜是 1894 年，尼泊尔是 1908 年。按照朝贡制度，蛮夷民族派代表正式向中国朝廷呈交礼品，认可他们的国家可能从中华文明获得的益处。这种朝贡体系与中国的对外贸易紧密交织在一起。朝贡使团往返中国首都的路程中受到皇帝的保护，并被允许在京城的市场进行贸易；这些市场由政府官员监督，以确保“公正公平的贸易”：“如果有任何人赊账购买并故意拖延（付款）、舞弊或试图‘夹塞’，导致外国人长时间等待，那么此人连同那些与其私下交易的人们将受到处罚；还将在他们的店铺前带枷示众一个月。”¹²³

天子（皇帝）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因此是互惠互利的：“附庸国顺从、虔诚，皇帝宽厚仁爱、居高临下。这些相互关系需要正式的表达。呈礼是进行一种仪式，平衡兼顾帝国

¹²¹ “在殷商汤王时期（公元前 1766-1754），氐羌人（在甘肃东部和青海地区的古老的藏部落）就对汤王进行朝贡。在太戊王时期（公元前 1637-1563），远方来朝贡的部落 [重译，因为那些部落非常遥远，需要重复解释] 包括了 76 个国家”（Fairbank and Teng, 1941: 142）。

¹²² 事实上，琉球在 1877 年组成了一个使团，准备坐船到中国大陆进行朝贡，但这一航程却被日本阻止了。

¹²³ Fairbank 和 Teng, 1941: 197、167。

款待和回赐礼物的形式。”¹²⁴ 所有希望与中国建立起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作为“中国的附庸国”这样进行朝贡，“承认中国皇帝至高无上，听从皇帝的命令，从而排除了平等交往的全部可能性”：

朝贡制度绝对不能解释成是征服或全面主宰的理念，因为它对那些选择不进入中国人天下的外国人不强加任何条件。朝贡寻求的是和平和安全，这两者与国际关系都是不相容的。如果一定要有关系，那么必须是宗主和附庸的关系类型，接受这种关系，对中国人意味着按中国道德认可蛮夷民族……绝不能以为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利。帝国回赐的礼物通常是比贡品价值更高……19世纪后半叶以前，中国朝廷官员对于应该或可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增进国家财政和财富的说法嗤之以鼻。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允许贸易的用意是标志帝国的赏赐并且使蛮夷民族保持顺从的适当状态。¹²⁵

来到中国朝贡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一度包括了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范围，以及更远的国家和地区。明朝 1587 年的一份朝贡国详细清单上列出了“由西域 38 个国家进献给朝廷的贡品”，全都“途经哈密”。¹²⁶ 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喀什、赫拉特、布哈拉、克什米尔、大不里士、撒马尔罕、吐鲁番、伊斯法罕、霍拉桑，以及作为“朗姆酒王国”和麦加。¹²⁷ 来自南海周围以及更远地方的国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派遣朝贡使团朝

¹²⁴ Fairbank 和 Teng, 1941: 147。

¹²⁵ Fairbank 和 Teng 引用 T.F.Tsiang, 1941: 140。

¹²⁶ Fairbank 和 Teng, 1941: 153。

¹²⁷ Fairbank 和 Teng, 1941: 154。

见中国的统治者。¹²⁸ 在 1587 年编制的一张明细清单中列出的朝贡者包括来自安南、暹罗、占城、缅甸、爪哇、文莱、婆罗洲、菲律宾、马六甲、卡利卡特、孟加拉、锡兰、叙利亚、霍尔木兹和马尔代夫。¹²⁹

贸易和文化

中国与亚洲。朝贡体系与贸易密切相关。但是，中国国际贸易的主体部分是在朝贡体系之外。除了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外，还有无数的外国商人在中国城市开展贸易，这些城市包括中国沿海港口，如广州、泉州和宁波，以及在北方和西部的内陆贸易中心，如西安和兰州。

中国的技术及其相关文化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瓷器的制作、丝绸生产、丝绸纺织和造纸技术传播到了中亚。中国的文化，包括书面文字和儒家官僚体系，对日本、韩国、琉球和越南北部影响很深。越南从中国独立出来后，1070 年在河内建造了文庙，直到 1779 年都起着越南官员的“大学”的作用。庙中的许多院落都有一长排石龟，每只石龟上都有一块石碑，上面用中文记载着考试上榜的候选人名字，这是基于与中国相同的儒家原则。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和日本的书面文字都是中文。儒家思想深入渗透到朝鲜、日本和越南。日本“禅”佛教的起源就是中国的“禅”佛教。¹³⁰

中国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比其对东北亚的近邻小一些。印度

¹²⁸ Wang Gungwu, 1998: 117~121。

¹²⁹ Fairbank 和 Teng, 1941: 151~152。

¹³⁰ Zurcher, 1964。

教、佛教和穆斯林文化传播到该地区主要是通过贸易。菲律宾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末都受西班牙的统治，由于天主教的广泛影响力，中国的文化影响受到了限制。伊斯兰教、印度教、天主教在东南亚大部分都证明了是比中国儒家思想更强大的文化力量。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大量华裔少数民族人口仍然是“旅居者”，与原籍的联系越来越疏远，但是仍然在相对封闭的社区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¹³¹一小部分东南亚华人经商极其成功，其中有几个人建立起了遍布整个区域的商业帝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过针对整个华人人口的袭击，部分原因是在他人看来的部分华人在商业上的主宰地位。

除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外，丝绸之路沿线的国际贸易帮助形成了文化传播进入中国的强大机制。佛教和伊斯兰教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

中国与西方。秦朝统一中国后两千年来，中国大部分时期是和平的，并且形成了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在那里，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随着时间的推移蓬勃发展和扩大。¹³²在市场失灵的方面，国家行使了至关重要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在这种结构下，中国的国民产值、大众生活标准、城市的繁荣、启蒙文化和技术创新水平，都远远领先于欧洲。¹³³

在众多技术领域，中国成熟的市场经济刺激了开创性创新，这远远早于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和期间，中国在技术的影响力方面占有相当强的主导地位。”¹³⁴中国早于西方的创新包括：丝织、造纸、印刷、火药、瓷器、炼钢、独轮车、指南针、船尾柱舵

¹³¹ Wang Gungwu, 2000。

¹³² Xu Dixin 和 Wu Chengming, 2000。

¹³³ Needham, 1964。

¹³⁴ Needham, 1964: 237。

轮、弓形板拱桥、船舶防水密封舱、曲柄和双作用活塞风箱，这些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蒸汽机的完整形貌”；还有脚蹬和高效马具。这些技术及其他技术主要是通过中国和外国商人，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的。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1583~1610年）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助于培育这样一种启蒙观念：通过合理的官僚结构统治而形成仁慈的专制是有可能的：“整个王国由满腹经纶者号令施政，这些人常被称为士。整个江山的有序管理完全依仗他们的责任心和职权。”¹³⁵ 1793年，乔治·斯汤顿爵士描述马噶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时说：“在自然和人工生产方面，其政府的政策和统一性、语言、举止和人民的意见、道德准则和民间机构，以及总体经济和国家的安宁，这一切都是可供人深思或研究的最了不起的对象。”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欧洲才赶上了中国，并且在之后的半个世纪内超过了中国。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人习惯性地就把中国视为“永远停滞”的地方。¹³⁶

结论

中国政府“海上和陆上新丝绸之路”政策的核心，是发展基础设施和商业关系。为扶持商业、促进社会稳定而建设基础设施，是中国自身两千多年长期繁荣历程的基石。中国这一新政策论述，是在古代贸易网络以及中国与中亚和东南亚之间文化传播的历史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远西的欧洲是这些网络的终点。19世纪之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相互作用大部分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中间贸易系

¹³⁵ Dawson 引述利玛窦，1964: 10。

¹³⁶ Dawson, 1964: 7。

统。参与这些贸易系统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居住在中国和远西之间区域的许多人。尽管与庞大的中国人口相比，他们人数很少，但是在中国的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有包括佛教徒、阿拉伯人、穆斯林、波斯人和印度人在内的中亚和东南亚关键贸易人群定居。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南海周边的地方定居。

中国过去的国际贸易与数量庞大的内部贸易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从中国与西面和南面周边地区深层联系的角度来讲却意义重大。中国与这些地区主要通过贸易关系，文化上长期深入共存、双向交流，促使它们在这幅千丝万缕的文化织锦中融汇交织。

从罗马帝国崩溃到 18 世纪，中国的商业化、城市化、技术和文化的水平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只是到了 16 世纪后差距才显著缩小。通过中国与中亚、东南亚的贸易和文化关系，发生了从中国到欧洲的长期技术流动；这有助于催生 16 和 17 世纪的军事和海军技术革命，西方靠这些技术革命征服海外。这种关系还对工业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通过工业革命，欧洲在 1800 年后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超越了中国。通过这种双重革命，西方迅速崛起，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其中包括中亚和东南亚。然而，欧洲工业革命至今时间不到 200 年，西方在与中国之间各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好比薄薄的一层饰面。在其之下，是中国与这些地区之间复杂深厚的重重关系“漆层”。这种互动关系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参考文献

- Bairoch, P.,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s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Fall, 269-334
- Beales, S., 1906,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Borao, J.E., 1998,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Spanish in the Philippines', *Itinerario*, vol 23, No 1, pp. 22-39
- Chaudhuri, K.N., 1985,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inton, H.,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 Clinton, H., 2012, 'Forestal Lecture', Naval Academy, Annapolis, January
- Dawson, R., ed., 1964, *The Legacy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wson, R., 'Wester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in Dawson, ed. 1964
- Fa, Hsien, 1886, *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airbank, J.K., and S.Y.Teng, 1941,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 2, June
- Fitzgerald, C.P., 1972,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London, Barrie and Jenkins
- Ghose, R., ed., 2008, *Kizil on the Silk Road: Crossroads of Commerce and Meeting of Minds*, Mumbai, Marg Publications
- Green, J., 1983, 'The Song Dynasty shipwreck at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s Exploration*, vol 12, pp. 253-61
- Ho Pingti, 1959,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egan, J., 1976, *The Face of Battle*, London, Jonathan Cape

- Lattimore, O., 1950, *Pivot of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 Levi, S., 1999, 'India,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Asian caravan route',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2, No 4
- Li, Bozhong, 1986,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 Hangzhou,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Li, Bozhong, 199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Basingstoke, Macmillans
- Li, Bozhong, 2000, *The early industrialisation of Jiangnan, 1550-1850*, (in Chinese), Shehui kexue wenjian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Liu, Xinru, 2010, *The Silk Road i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han, A.T., 1890, *The Influence of Naval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London, Methuen edition, 1965
- Needham, J., 1970,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dham, 1964, '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in Dawson, ed., 1964
- Nolan, P., 2013, 'Imperial Archipelagos', *New Left Review*, No 80, Second Series, March-April, 77-98
- Polo, Marco, 1974, *The Travels*, Penguin Books
- Reischauer, E.O. and J.K. Fairbank, 1958,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J.K. Fairbank, E.O. Reischauer, and A.M.Craig, 1965,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Schafer, E.H., 1985,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 Shen, Jianming, 2002,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 Historical

-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1, pp.94-157
- Shiba, Y., 1977,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in Skinner, ed., 1977
- Schottenhammer, A., ed., 2001,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Leiden, Brill
- Sickman, L., and A.Soper, 1956,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Skinner, G.W., ed., 1977,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ucek, S., 2000,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rr, F., 2013, *Lost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argardt, J., 2001, 'Behind the shadows: Archaeological data on two-way sea trade between Quanzhou and Satingpra, South Thailand, 10th-14 century', in Schottenhammer, ed., 2001
- Stierlin, H., 1998, *Turkey: From the Selcuks to the Ottomans*, London, Taschen
- Sullivan, M., 1964,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art', in Dawson, ed., 1964
- Talbot-Rice, T., 1965,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Tracey, J.D., ed. 1990,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witchett, D., and Stargardt, J., 2002, '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 century Indonesian wreck', *Asia Major* (3rd Series), vol 15, Pt I, pp. 1-49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Washington DC
- Wang, Gungwu, 1990,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y', Tracey, 1990
- Wang Gungwu, 1998, *The Nanhai Trad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Wang Gungwu,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Xi Jinping, 2013, Speech to Indonesian Parliament, 2 October

Xi, Jinping, 2014a, Speech at the UNESCO headquarters, 28 March

Xi, Jinping, 2014b, Speech at the College of Europe, 1 April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 2000, *Capitalism in China, 1522-1840* , translated by Charles Curwen, Basingstoke, Macmillan,

Zurcher, E., 1964, 'Buddhism in China', in Dawson, ed., 1964